

年度长篇小说

张翎《归海》
作家出版社 2023年10月

张翎：只有母语可以抵达“传神”境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

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(左)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社长任天阳(右)共同为张翎颁发奖杯、证书及约稿函

致敬辞

张翎的《归海》把追溯历史文化的触角伸向“根”与“路”，在“寻找别人的珍珠”的过程中直面与疗愈伤痛，也在“打开自己的蚌壳”的同时完成自我重建。作品借助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叙事，唤醒个体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记忆。在深海沙砾的碰撞、周旋与流转下，走出与归家的命题已剥离掉陈旧的寻根外壳，浮露出跨越国界民族、省思战争创伤的阔大视野。



访谈

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的虚构

羊城晚报：《归海》讲述了在加拿大生活的袁雨追忆母亲袁春雨身世的故事，请问写作初衷是什么？
张翎：《归海》是我计划中的《战争的孩子三部曲》的第二部，第一部是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《劳燕》。为了维生，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。在我的患者中，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，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。我和这群人有过多年接触，从他们身上，我感受到了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，他们让我思考“创伤”的话题。灾难的“溢出物”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，正好有一片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。我就把这些印象和灵感移植到了自己的母语写作中，于是就有了《归海》这部小说。

羊城晚报：《归海》的人物或情节是否有原型？
张翎：和《劳燕》一样，《归海》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。《归海》里的袁春雨，是一个典型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。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，是许多战争幸存者的故事的缩影，她是完全虚构的，同时又是完全真实的——虚构的是人物，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，则是完全真实的。

羊城晚报：《归海》是您第一部用英文写作的作品。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的感受如何？
张翎：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学英美文学的，用英文写一本通顺的小说想来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但我从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使用母语，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母语可以抵达我心目中的那个“传神”境地。再熟练的外语，至多也只能做到“达意”。

个人简历



张翎，浙江温州人，海外华文作家、编剧。代表作有《归海》《劳燕》《余震》《金山》等。曾获曹雪芹华语文学奖等奖项。根据其小说《余震》改编的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，获得包括亚太影展最佳影片、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。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。

找到非常牢靠的归属感

——张翎

非常感谢花地文学榜这次关注一位海外作家。我是常年生活在不讲汉语的地方，用母语写作，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有一点艰难和尴尬。

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种“归属感危机”，经常想自己属于何处？但随着日子慢慢过去，我慢慢长大后，突然就不那么纠结了，因为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牢靠的归属感，那就是我的母语。无论居住在哪里，走到再远的地方，它跟我有一种血脉关系，是一种永远相互属于的关系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蒋晨璐

时代不同，难有余光中式的“乡愁”

伤痛和耻辱的隐忍。女作家注定是女性视角吗？

张翎：女作家是一定会产生产生女性视角的，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。但女作家不一定完全固定在女性视角上，她还可以有“普世”的超性别的视角。

羊城晚报：女性视角是不是也会造成某种遮蔽或自蔽？

张翎：“遮蔽”和“自蔽”是视野和惯性思维的问题，和性别不一定有关系。对一个作家来说，真相本来就是主观的观察结果，所有世界上的文学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，因为观察的本质就是主观的。无数个主观视角得到呈现，事件和记忆就变得丰满而多维。最重要的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主观，也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主观。

羊城晚报：一直以来，“失

根”与“寻根”都是众多海外华文学家的书写主题，但您的写作似乎无意过多关注这两种关系的辩证，而是聚焦历史中个体生命的伤痛。为什么？

张翎：这可能和我开始写作的时机有关。我持续性地发表作品时，已经在海外生活了一段时间。我在维生的道路上走了很久，当终于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写作时，我已经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文化适应期，移居早期的那些激烈的情绪，已经得到了缓解和平复。再者，我开始写作时，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发展，通信和交通变得轻而易举，我可以和国内的亲友们保持密切而即时的联系，也可以随时回国，甚至待上一段时间。地理阻隔不复存在了，就很难再产生余光中年代的那种乡愁。

写作是我唯一的“定海神针”

羊城晚报：您日常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？

张翎：在处于写作状态时，我一般早上醒来（其实已经接近中午），不洗漱不吃早饭，立刻坐下来开始写。写一段落，再吃个早午饭，稍事休息，午后再写两三个小时，就收工了。晚上不再做“输出”的事，只做休息和“输入”，比如看电影、看剧、读书，或者和朋友吃饭聊天。我一天写作的时间不长，从不干涩地写，一旦感觉滞涩，立刻就停下来，等待灵感再次找到我。每天也不把灵感写完，留一口气给明天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经说过写作是您的“自救”，“自救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？

张翎：年轻时说“自救”，是觉得自己被倾诉的欲望逼到墙角，不抒发不行。现在说“自救”，是有感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。在如此分裂动荡的大时代里，写作是我唯一的“定海神针”，保护我不被恐惧和不安吞没，让我在迷茫中保持清醒，找到一样确定的事，能够不被眼前的纷乱所动摇。

羊城晚报：您此前说过在创作《劳燕》时已有写“战争的孩子”三部曲的想法，如今是否已在进行第三部的写作？预计何时推出？

年度短篇小说

韩东《幽暗》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3年5月

韩东：“杰作”无限受限的只是年龄和体力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

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社长、总编辑林海利(右)与广东省文联副秘书长梁少锋(左)共同为韩东颁发奖杯、证书及约稿函

致敬辞

韩东的《幽暗》保持着小说创作一贯的风格，冷峻、克制、幽默，于细微处见真意，以精致的故事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去透析人的复杂性，与现实的荒诞感。作为小说家，韩东严谨、低调且细腻，但他还是诗人和导演，因此，对于小说语言的锤炼更为精到、唯美，且手法多变，看似寻常的故事在他的讲述里，幽微巧妙，暗藏深意。



访谈

所谓“虚构的才是小说”是误导

羊城晚报：据说，小说《幽暗》是您“时隔20年重返中短篇小说写作”，为什么会有“退出”“重返”？
韩东：我比较集中写中短篇小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，当时曾被评论界誉为“新状态”或“新生代”的代表作家之一。2000年以后，我开始写长篇小说，中短篇就放下了。十五年里，我写了六部长篇，其间只写过三五个短篇，中篇完全没有写了。在2016到2018年，我还去拍了一部电影、导演了一台话剧，2019年又回过头来写中短篇，一直写到现在。

羊城晚报：创作来源于生活。有人说《幽暗》和《狼踪》这两本小小说集，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您本人的生活轨迹，您认为呢？
韩东：当然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小说写作上有很多误导，比如流行的一种就是虚构，说虚构的才是小说。这个说法我是反对的。在我看来，小说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、一种特殊的文学方式，同样的一件事，我们也可以不写成小说这种形式。小说的修辞方式包括现场感，包括对白和内心独白，包括现在，它是一种“身临其境”。有了这些，你写的就是小说，否则就不是，或者不太是小说，或者说小说味不浓。

羊城晚报：小说集里的《我们见过面吗》《老师和学生》《死寂孤独》等短篇都在凸显人性或人际关系的微妙和复杂性，您似乎很喜欢表现这种人情世故？为什么执着于此？
韩东：对我而言，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关系，各种各样的关系，经过叙述，才可能产生你所需要的戏剧性。这倒不一定就是人情世故。人情世故是一种特定的关系，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动物时，有关阶级沉浮的某种技巧和应对。我叙述的关系显然不局限于此，大多是属于非主流的，小说并不是教你如何做人的，它提供的是鲜活的生活体验。

羊城晚报：花地文学榜的初评评委张惠雯评价您的作品《幽暗》时说“打通了诗歌与小说之间的通道”，您认同她的说法吗？
韩东：写诗的训练对我写小说肯定有很大的影响。别的不说，首先体现在语言方面。我对语言的较真有时会达到病态的程度，对语言不好的小说我很难读进去，尽管在故事的层面可能会不错。至于我本人，从写诗到写小说的转变并不存在，我写小说的历史几乎和写诗一样长。

一名自诩的“作品主义者”

曾经有人说，我是诗人中小说写得最好的。一开始我很受用，再一想就觉得话中有话了。如果换一种说法，我是小说家中诗写得最好的，想必我就欣然接受了。可见，小说获奖对确立我小说写作的信心还是更紧要的。事实上，我写小说的历史和写诗的历史一样长，只是诗歌妨碍了大家去了解我的小说，这些就不去说了。

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，广州是我的福地。二十年前，我曾获得广州媒体颁发的小说家奖；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因小说获奖，又是来自广州的奖励，实在是荣幸之至。至少我在广州可以自称是一个小说家，暂时摆脱诗人的虚名。据说小说家是一群更加务实的人，至少在广州我可以脚踏实地不再轻盈。

无以回报，作为一名自诩的作品主义者，我只有将小说写得更好，至少也有所进步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走上写作道路的？如果不写作，您会做什么？
韩东：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写作，并在期刊上发表了作品，那时大约十九岁吧。如果不写作，我大概会做什么事。具体的倒没有想过，也许会去修行——实际上写作也是一种修行。具体的社会性工作倒没有想过。也有可能去做导演，但导演工作亦属于大范围的写作。

写出我知道的与塑造出不朽的作品

即兴，有所触动也会抑制住，作为某种积蓄，越是写体量比较大的东西越会如此。活了六十多年，又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，人生中累积的“素材”实在很多。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些重要的人和事写出来，将其塑造成为作品。实际上这是两个目的，写出我所知道的和塑造出不朽的作品，二者可望合一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说自己就是要写出“现代汉语最高标准”的作品，这个“最高标准”具体指什么？
韩东：当然是我个人的指标，也是写出来之后才会显露

“真爱”排序：写作、写作、写作

羊城晚报：《在码头》之后，您近年还有执导新的影视作品吗？
韩东：没有再执导过。导演工作有一部分我也喜欢，就是和各种智力的合作，但做导演要依赖很多其他因素，很烦人。排序是：写作、写作、写作。顺便一说，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编剧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一位写作者，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
韩东：和各行各业一样，最重要的素质是专注。天分、热爱和专注，天分是资本，热爱是动力，专注是整合前二者的根本保证。

羊城晚报：有哪些作家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？
韩东：太多了，列举不完的。大致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经典作家，已故大师，一部分是同一时代的作家、诗人。我最近在读莫桑比克作家米亚·科托的《入夜的声音》，很有启发；再推荐一位当代汉语作家谈波，他的两本小小说《捉住那只发情的猫》《大胆使用了绿色》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出版。我之所以提及他，是因为他写得如此之好又如此寂寂无名，与当下写作者的主流也如此疏离。

个人简历



韩东，小说家、诗人，出版小说、诗歌及散文随笔集约50部。小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和小说集《我的柏拉图》等。曾获凤凰文学奖、先锋诗歌奖、鲁迅文学奖等。